

「重慶道路」及其群眾基礎

張宇

「重慶道路」是毛左派給予薄熙來讚譽時的稱謂，本文接受這一稱謂，但卻持相反的價值趨向。所謂「重慶道路」，是指2008年以來發生在重慶的、由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主導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方向。這些事件包括意識形態和司法方面的「唱紅打黑」與經濟方面的「重慶模式」（筆者根據需要有時也在行文中稱之為「重慶事件」）。儘管人們通常拿文革來比附「重慶道路」或「重慶事件」，但仔細觀察，發生在霧都的這一系列事件，大多並不具有文革歷史的典型特徵。

比如最受人詬病的「打黑」（打擊黑社會行動），其中「黑打」民營資本家，就沒收資本而言，更像發生在1956年的「公私合營」，但又不具備公私合營的方向明確性和政策公開性；「黑打」的對象也只限於重慶當地的資本家，主要是薄熙來、王立軍不喜歡者，而並非所有民營資本，也全無公私合營時的細膩柔和政策宣導。就打擊方式而言，又很像1950年代初的「鎮反」，無需很明確的法律和程序，只要沾點邊兒，就列為打擊對象，但又畢竟發生在一個普遍講究法律和程序的時代，只好以刑訊逼供和偽造證據來滿足形式上的法律和程序之需要。事實上，相比1950至1970年代的歷史，重慶的「黑打」在國家統治方面已經貢獻出了新的內容。

「黑打」起初只是相對「打黑」而言，即以「黑社會」罪名入罪，不顧法律和程序的司法行為。但在薄熙來和王立軍倒台之前就已顯露端倪、在其倒台之後更是被大面積揭露出來的，還有針對普通市民在互聯網上發表批評之言的「黑打」。一段微博，一句跟帖，幾篇轉發的帖子，都會招致一至二年的勞教，或刑事／行政拘留。就形成的社會恐怖而言，倒是有些文革的影子，但文革是群眾監督和群眾專政，重慶的恐怖則完全來自專政機關。

這種恐怖更瀰漫於司法部門，主要是公安機關。近期公布官方資料稱，「截至目前，一共接到了1,123名民警的申訴，涉及需要複核的民警為2,202名」^①，其

所謂「重慶道路」，是指2008年以來發生在重慶的、由薄熙來主導的一系列事件及其所代表的方向，包括意識形態和司法方面的「唱紅打黑」與經濟方面的「重慶模式」。儘管人們通常拿文革來比附「重慶道路」或「重慶事件」，但這一系列事件大多並不具有文革的典型特徵。

中大多是根據主宰者的好惡，以莫須有的罪名而形成的冤假錯案。而繫獄期間，這些警界高官和普通警察，很多遭遇了「戰友」的非人刑訊逼供，以至「一些人放出來後，『世界觀被改變了，工作不積極，也不想再當官，說話走路做事還是小心翼翼、噤若寒蟬』」^②。這種內部的大面積迫害，在文革中是常見的，但卻不是文革的典型特徵，從1949年前的戰爭年代的內部清洗到1950年代的各種運動莫不如此。而且自1949年以降，這種內部的成規模的清洗，並不以施酷刑為慣例；文革中雖有大量暴力毆打，但基本上來自群眾專政（雖亦有少量專案組曾對審查對象暴力相向的事件發生）。

真正具有文革特徵的，是重慶的「唱紅」，以及伴隨「唱紅」而來的各種極端化和迷信化，如「唱紅」能治不育症、精神病等奇特療效^③，令公眾想起文革期間《人民日報》的那篇著名社論〈靠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1971年8月10日）。「唱紅」作為一種國家行為，以「運動」而不是「常態」的形式向整個管制範圍強力推行，這是文革時期才有的方式。

至於經濟方面的「重慶模式」，則是「計劃政治」之下的「市場經濟」的變種，壓根兒與文革無關。

人們願意從文革的視角去審視和省思「重慶事件」，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在薄熙來下台前的兩會記者會上，暗示出「重慶事件」與文革的內在關聯。顯然，人們的文革視角，其實並不僅僅着眼於「文革歷史形態」，毋寧說更着眼於「文革邏輯」。

一 「唱紅」風潮：「文革歷史形態」與「文革邏輯」之辨

如上所述，「重慶事件」大多不具備文革典型特徵，然而，人們仍然願意從文革的視角去審視和省思「重慶事件」，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在薄熙來下台前的兩會記者會上，暗示出「重慶事件」與文革的內在關聯。顯然，人們的文革視角，其實並不僅僅着眼於「文革歷史形態」，毋寧說更着眼於「文革邏輯」。而「文革邏輯」也並非只在文革時期發生，而是早已內在於所有被稱為「極左」的歷史形態之中，只是在文革時期才以集大成的形式全面爆發。

儘管相比文革前的其他「極左」歷史形態，文革也貢獻出了新的內容，如由國家領袖發起全國性群眾運動，以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動員人民造反，讓民眾在「奉旨造反」中獲得了一個喘息和爆發的機會，也為1968年西方大學生的造反運動（法國「五月風暴」）提供了形式方面的啟示，並為今天國內被稱為「新左派」、「毛左派」的人們所津津樂道；但從歷史上一直繼承下來的「極左」邏輯（「文革邏輯」），則注定了這場特殊「運動」和特殊「內戰」的失敗結局。對於反思「重慶事件」的人們，如果不能區分其中「消滅社會」的「文革邏輯」和全面動員社會參與這一「消滅社會」過程的「文革歷史形態」，如果僅僅以「文革歷史形態」去想像和比附發生在重慶的一切，儘管可起到一時痛批之效，卻會狹窄化對這個大事件的認知，包括本文着重探討的「重慶道路」的群眾基礎。

事實上，正是2008年下半年開始的、正式名稱為「唱讀講傳」（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唱紅」，讓人們第一次把「重慶」和「文革」聯繫起來，而且是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兩個思想派別——自由派和毛左派的共同解讀。但如

果不是接下來以「打黑」為標榜的「黑打」，在重慶肆無忌憚地全力推進，以至公然陷害行使正當權利的律師、勞教僅僅發了個惡搞微博的網友，那麼自由派網友和知識份子尚無公開批判的着力點。因為「唱紅」所內涵的傳播「紅色文化」，正是官方意識形態的題中應有之義，只不過在原有的「主旋律+多樣性」結構裏，「紅色文化」只是「主旋律」的一種，是被始終肯定、乃至倡導以維護執政黨合法性的文化因素，而非「主旋律」的全部。自由派網友和知識份子對此只能在非正式媒體（如網絡上）有限度地加以批判和嘲諷，並無形成公開論戰的平台。所以，在重慶「唱紅打黑」業已聲名狼藉的今天，仍然無法在正式出版物中看到對於「紅色文化」的任何批評，與此同時，宣傳和褒獎重慶「唱紅」的文章依舊赫然陳列着。自由派網友和知識份子只有啟動「文革」的歷史想像，才能曲折地達到部分批判的目的。

然而，對於毛左派而言，重慶的「唱紅」卻是一次絕好的歷史契機。毛左派是一個最初借殼於1990年代後半期崛起的「新左派」、到新世紀最初幾年才通過互聯網，進而通過地面的廣泛聯絡而登台亮相的思想派別。毛左派的意識形態非常清晰，那就是全面肯定毛澤東和文革的價值。正是這種「全面肯定」，使其在政治路線和經濟主張上走向與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全面對抗。這一在1980年代常常被認為是「明日黃花」，或至少不會再被公開言說的意識形態，卻因中國市場經濟道路的日益權貴化而絕處逢生，成為對當下的影響僅次於自由派的思想派別。他們簡單卻也成功地解釋了現實，認為當下所發生的一切，正是毛澤東晚年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復辟（最常引用的毛語錄是「我死後，右派一定會翻案，但右派翻案是不得人心的，是遲早短命的！」），其禍首正是「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資產階級右派」（自由派知識份子）則是其幫兇，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已淪為殖民經濟……

許多自由派網友輕蔑地將毛左派及其主張視為智力問題，並以「腦殘」、「痴心妄想」、「幾個揣着明白裝糊塗的聰明人，領着一群揣着糊塗裝明白的傻子」等來形容之。但事實上，如果仔細考查，就會發現其中並無多少人真心地相信歷史還可以再回到文革那種社會形態。毛左派更多像是在現實中爭奪一種話語權，或爭奪參與未來的權力。但其思維所帶有的強烈的獨斷性特徵，往往使他們以「文革大民主」來想像自己佔據主導地位的未來社會，而忘記了自己在清醒時刻的理性認知——「肯定毛時代，並不是要回到毛時代」^④，從而讓公眾更加坐實了其要倒退回文革的努力。

在重慶「唱紅打黑」業已聲名狼藉的今天，仍然無法在正式出版物中看到對於「紅色文化」的任何批評，與此同時，宣傳和褒獎重慶「唱紅」的文章依舊赫然陳列着。自由派網友和知識份子只有啟動「文革」的歷史想像，才能曲折地達到部分批判的目的。

二 尋找新「克里斯瑪」：毛左派的內在特質

正是從重慶的「唱紅」開始，毛左派給予薄熙來以充分的想像，也給予他及王立軍以最強有力的民間支持。在重慶「唱紅打黑」風生水起的日子裏，也是毛左派網站「烏有之鄉」最為活躍興奮的時刻，網站不僅全面配合重慶「唱紅打黑」

及經濟方面的各種政策措施，全力謳歌「重慶模式」，而且直接呼籲讓薄擔任國務院下一任總理，並通過薄想像毛左派未來的政治命運。如武漢前紅衛兵領袖李乾在一篇文章中記述有毛左派領袖張宏良在場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人告誡直率的發言者：「老同志，不要犧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國就要大變的。」^⑤而毛左派網站也曾有一段時間裏，不斷放風說張宏良將成為中共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為此，以「烏有之鄉」為主陣地的毛左派，開始改變策略，由一味批判堅持鄧小平路線的中國當局，轉為「一打一拉」——打擊所謂「普世派」領導人（如溫家寶），肯定和等待他們想像中的「回歸毛主義」的領導人，並將毛左派的主張用八個字定義下來，即「保黨，救國，反帝〔美國〕，鋤奸〔自由派〕」；而薄則被認為是最能體現這一綱領的黨內領導人。

在「烏有之鄉」將毛左派的主張固定為「八字方針」之前，發生了「重慶10·15事件」。2009年10月15日，來自全國二十幾個省市區的三十四名「毛主義信仰者」，被指在紅都重慶集會，涉及組黨事宜，被重慶警方悉數拘捕，其中四名活動家分別被判處十年或五年徒刑^⑥。這個事件雖然在毛左派內部引發部分人對薄熙來的質疑，但這種質疑也很快被「不得已」的「理解」所替代。兩年後的2011年8月，四川省、重慶市文革時期的部分官員（革委會常委等）給薄熙來發公開信，讚揚他自從2008年到達重慶後，搞「唱紅打黑」等，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發揚，希望薄能關注一下他們「三十五年來生活無着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無住房，無醫療甚至現在還有人住岩洞」的苦難，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⑦，但是申訴無果。接連的受挫看起來並沒有降低毛左派對薄的熱情和想像。筆者曾在2010年當面詢問過幾位毛左派活動人士：「你們真的相信薄熙來會像你們一樣，真心熱愛毛主席，肯定文革嗎？」幾位老人均搖頭，但卻回答說：他既然打出毛主席的旗號，我們就要利用他這一點。另外，一位論者則直截了當地指出，「以薄為焦點團結群眾」是「我們」的「現實需要」^⑧。

在重慶「唱紅打黑」熱火朝天的鼎盛時期，擁護薄熙來已經成為毛左派內部的「政治正確」行為，即使對薄本身有疑慮者，即使不滿於張宏良等人的「保黨，救國，反帝，鋤奸」主張者，也不敢在所謂「重慶道路」上說三道四。事實上，在2011年上半年，毛左派內部就已經在意識形態、進而在組織上發生了分裂。其中被認為是「原教旨派」（他們自稱「革命派」）的論者公開挑戰張宏良等人，認為後者是向「走資派」繳械投降，一時形成了以「紅旗網」、「解放區的天」等為一方和以「烏有之鄉」為另一方的大論戰。但在互指對方為「敵人」的激烈爭論中，也鮮有涉及薄和其他主張「重慶道路」者。

直到薄熙來、王立軍落馬，才有「革命派」人士發文指出王的「打黑」不過是「嚴打」的繼續，而非毛的「群眾路線」；薄的「肅貪」，則刑不上「副部級」，只是政治洗牌式的選擇性肅貪，藉此說服毛左派群眾從對薄、王的迷信中走出來^⑨。但這種聲音遠低於「烏有之鄉」的高聲吶喊，在薄於2012年3、4月間被宣布立案調查後不久，「烏有之鄉」就發表了〈關於薄熙來事件的聲明〉，堅持認為薄「所開

直到薄熙來、王立軍落馬，才有「革命派」人士發文指出王的「打黑」不過是「嚴打」的繼續，而非毛的「群眾路線」；薄的「肅貪」，則刑不上「副部級」，只是政治洗牌式的選擇性肅貪，藉此說服毛左派群眾從對薄、王的迷信中走出來。

關的『重慶道路』，是恢復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性，挽救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是全體中國人民共享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革命、建設和發展成果的唯一正確的道路……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烏有之鄉都毫不動搖地支持『重慶道路』^⑩。而在半年後的「9·18」反日遊行中，「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的橫幅和標語，更是充斥着遊行隊伍。大概近二十年來也沒有一個被罷黜的高官獲得過如此堅定的民意支持，禁中的薄本人若得知這一情形也會倍感安慰。

然而，考查薄熙來與「烏有之鄉」和毛左派的歷史關係卻又發現，儘管薄和重慶方面亟需輿論的炒作和由此喚起的民意支持，而「烏有之鄉」又是如此一馬當先、高調、直接，但薄本人卻一直小心翼翼地與毛左派領袖保持距離。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邀請了新左派學者出任研究員，也邀請了意識形態接近「烏有之鄉」的媒體活躍人士(如司馬南)^⑪，但卻尚未見邀請毛左派的任何活動人士。種種迹象，包括一些未經證實、卻符合薄的性格邏輯的傳言顯示，薄既視毛左派為正資產，也視其為負資產。這種矛盾的情形，不僅取決於薄作為黨內大員仍然受黨內規則和潛規則的約束，還因為毛左派意識形態的清晰性和內部聯絡的相對密切。對於薄這種企圖「創造歷史」的政治家而言，他既願意得到這個思想派別的強有力的輿論支持，又不願其成為自己未來大展手腳的約束者。這反映了毛左派在歷史中的某種尷尬的悲劇性，即它在孕育時刻就不具有獨立性，而是依附於一個政治領袖，尤其是依附於一個具有「克里斯瑪」人格的強大人物，後者的方向往往決定前者的方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毛左派的成型也依然攜帶着這種特質，結果便是，要麼它向社會民主主義靠攏，要麼它本身創造出一個，或在別處尋找來一個領導人物，而薄正是他們在別處尋找出來的一位「克里斯瑪」。這也說明了為甚麼毛左派需要薄與薄需要毛左派之間的不成比例，從而形成「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原因。

種種迹象，包括一些未經證實、卻符合薄的性格邏輯的傳言顯示，薄既視毛左派為正資產，也視其為負資產。這種矛盾的情形，不僅取決於薄作為黨內大員仍然受黨內規則和潛規則的約束，還因為毛左派意識形態的清晰性和內部聯絡的相對密切。



隨着薄熙來和王立軍退出歷史舞台，毛左派網站「烏有之鄉」也於2012年4月一度關閉。

正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中國再回到「文革歷史形態」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然而，「文革邏輯」卻依然可能在大行其道。薄熙來一方面依據「文革邏輯」在重慶展開轟轟烈烈的「唱紅打黑」，另一方面又憤怒於知識界及黨內同事對其要重返文革的批評和暗示。筆者認為後一個方面的憤怒是真誠的，薄的確不想回到文革那種歷史模式——靠領袖的威望和威權拋開龐大的官僚機構，直接指揮更龐大壯闊的民眾隊伍。他能夠做的僅僅是利用非法治化的官僚機構以達到其政治目的。也因為如此，薄才遠離毛左派，因為後者根本不是他所設想的最佳群眾基礎。對此，毛左派的一些領袖人物也心知肚明，所以才在重慶「唱紅打黑」日趨鼎盛之際，調整自己的「原教旨」路線，提出以「保黨」為核心的新路線，不僅向薄，也向其他不談「普世價值」的領導人頻頻示好，並準備躋身於執政黨的組織結構中去。毛左派自身的內在邏輯，決定了其必須把自身體制化，才能夠找到明確的歷史方向，從而適得其所。

三 「人民」的「部分」：「重慶道路」的民粹主義基礎

既然「一頭熱」的毛左派並非薄熙來及其「重慶道路」的理想群眾基礎，那麼甚麼樣的人才是這樣的群眾基礎？筆者以為是：與毛左派具有同構的文化心理，而意識形態不清晰、面容也模糊不清的「路人甲」、「路人乙」……這些「甲」和「乙」不僅走在重慶街頭，也行走在珠江兩岸和華北平原，行走在中國大大小小的角落裏。這裏當然不是指全體「人民」，但他們卻是「人民」——民眾的一部分。

在薄熙來、王立軍戲劇性地退出歷史舞台之際，自由派網友曾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的歷史必然性心態接受這件事，但很快發現，對薄的懷念並未被「世界潮流」滌蕩而去。最初的懷念、唱頌之聲自然是來自毛左派——即使表面上是以一個重慶普通市民的身份出現，不涉毛左派的關鍵詞，但其洋洋灑灑的內容和清晰的意識形態邏輯脈絡也分明昭示了這一點。但很快，從重慶的親友，從去重慶出差的同道那裏，這些網友得到了一個令人不快的消息：薄、王雖以刑事犯罪的性質被處置，但重慶不少市民卻真心懷念和稱頌他們：「治安好了！」「有安全感。」「薄熙來還是幹了不少好事的。」「政治鬥爭罷了，我們草民不管這個，誰對我們好我們就對他好。」筆者的一位同道朋友，在重慶的出租車上就這個問題與司機爭執起來，竟差一點被趕下出租車。境內媒體在採訪或播出節目時，受制於宣傳紀律的約束，自然會自動進行意識形態篩選，但來自境外的媒體卻可以播發出不同的聲音。由鳳凰網策劃的一個名為《重慶·2012》的電視節目，便留下了不同聲音的記載^②：

鄧先生（國企退休工人）：「文化大革命到現在，能夠為人民帶來利益，給人民帶來好處，看得見摸得着的，除了薄熙來沒得第二個。」

在薄熙來、王立軍戲劇性地退出歷史舞台之際，自由派網友曾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的歷史必然性心態接受這件事，但很快發現，薄、王雖以刑事犯罪的性質被處置，但重慶不少市民卻真心懷念和稱頌他們。

賈先生(西南政法大學退休職工)：「搞形式主義，浪費很多錢，到處去其他地方去演出……。薄熙來這個人有野心，突出個人，另搞一套，他就是搞獨立王國……(以下批薄者略)」

張樹森(重慶紅歌會會長)：「他(薄熙來)在我們要唱，他不在我們也要唱啊。」

盧小姐(十八梯子店家、三峽移民)：「薄熙來在這裏啊，治安要比以前好一點，這是我的老實話。」

民心佳園公租房住戶(男)：「當薄熙來那個時候，沒有甚麼偷啊搶啊撿啊摸啊都沒得。」

大學一年級學生：「我個人認為啊，薄熙來同志的確是個很優秀的人。」

西南政法大學女生：「我覺得他(薄熙來)原來人還可以啊，但他妻子犯罪啊！」

民心佳園公租房住戶(女)：「(你覺得唱紅歌這事兒好嗎?)好啊，共產黨來了嘛都好嘛！唱紅歌兒思想開放嘛，身體也健康了嘛。」

七公里村原住民：「老歌曲就是紅歌，不忘革命不忘本。……交巡警平台，任何地方出點事兒，兩三分鐘、四五分鐘之內就要趕到，一般地說那些犯罪份子就都不敢動了。」

對此，通過片中人之口，也分析了這種懷念和稱好的原因。例如，曾是刑辯律師、在重慶打黑案中被判入獄的李莊指出，「他們確實是把20%人的財富，給了一部分用在了民眾身上[建交巡警平台]。」「黑打」受害者親屬羅皓質疑：「重慶的普通百姓覺得警察多了，平台多了，安全感就來了。那麼我反問一下，那最好是不是應該我們每一個家庭，都給你派一到兩個警察來？……那是用錢堆起來。」重慶律師協會會長韓德雲分析：「[薄、王]做了一些事，但是他人為地、誇張地、極端地放大這個事。他放大背後的基礎，是把階層的矛盾有意地煽動起來，讓他們分化和對立，再走向對抗。這說明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分化了，薄熙來、王立軍式的人物，有他的社會基礎，有他所代表的社會階層的支撐和支持。」^⑬

溝口雄三對中國獨特的共和思想和獨特的「近代」及「近代的母體」的分析，暗示出當這種隱含在歷史和風俗中的「近代」邏輯，能夠「各得其所」地順利展開時，中國就可能走向健康、光明之路；而當其把「個人」等同於「私利」而加以排斥，從而走入極端之時，就可能出現歷史悲劇。



重慶兩江新區龍興古鎮內的毛澤東思想宣傳欄

我們還可以沿着這個思路，像慣常那樣繼續分析，諸如薄熙來、王立軍如何以政治手段飾演大眾明星，「以野蠻對抗野蠻，用犯罪的方式打擊犯罪，以犧牲法治為代價來淨化治安」，從而迎合多數人，煽動民粹主義，對少數人為所欲為，將中國引向準法西斯道路^④。這樣的分析固然正確，也不乏深刻，但仍沒有進入那個被命名為「中國民粹主義」之概念的內核，批判起來也像隔靴搔癢。也許只有借助第三者的眼睛，才會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入的思考——筆者取日本歷史學家、思想家溝口雄三的「中國近代與前近代的關聯說」。

四 「大公」—「大私」—「大公」：「中國民粹主義」的「前近代」根源

中國「現代」歷程的曲折，僅僅是政治精英乃至領袖選擇了錯誤的道路？還是他們本身內在的、也受制於中國獨特的歷史結構？在制約中國「現代」道路的這種歷史結構中，民眾究竟佔有怎樣的地位，並發揮着怎樣的作用？

溝口雄三認為，「中國的近代原先就是以自身的前近代為母體的」，因此「從一開始走的就是一條和歐洲、日本不同的獨自的歷史道路，一直到今天」。這種被溝口概括為孫中山所謂「王道」的思想淵源——「大同理想」，正如同盟會宣言中所言：「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大同」一詞雖早自先秦就有，但作為中國「近代」之「母體」的大同思想，卻產生於明末清初，為黃宗羲、王船山，乃至更早的呂坤所提出。其所配合的，也正是從體現「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的一君萬民之專制體制，向「富民」分治型之專制體制過度的時代，即反對皇帝的「大私的獨佔」，走向士紳自治和「萬民之私」，甚至主張彼此「各得其所」。「到了十八、十九世紀，隨着鄉村地主制結構的進一步發展，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主要矛盾，……萬人得其所的思想內涵得到了大膽切實的展開。戴震把農民的生存權也納入「得其所」中，龔自珍更提出「平均」的思想，「經過太平天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無處不均匀，無人不保暖』的烏托邦式的幻想下引起的大動亂，直至晚清共和式大同思想，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條漫長的、多層結構的道路」^⑤。

在溝口雄三看來，這正是中國的「近代」（包括中國的共和式革命）的「母體」。所以孫中山才把革命的主要目標設定為「要四萬萬人都是豐衣足食」（《三民主義》），革命家陳天華在批判專制政體時也透露出對共和的想像：「現政府之所為，無一不為個人專制、強橫專制者，其干涉也，非以為總體之自由，而但以為私人之自利。」（《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這種「大公」和「大私」、「總體之自由」和「私人之自利」的對立，一直充斥着中國現代時期的共和思想，並延續到毛澤東的人民民主專政，儘管其間也吸收了歐洲的民權、平等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這與歐洲共和思想的主要內容是「確立私有制為基礎的政治權力上的自由和平等」，適成鮮明對比^⑥。溝口對中國獨特的共和思想和獨特的「近代」及「近代的母體」並未採取批判的態度，他只是指出了其中固有的矛盾、悖論和「扭曲」^⑦，暗示出當這種隱含在歷史和風俗中的「近代」邏輯，能夠「各得其所」地順利展開

時，中國就可能走向健康、光明之路；而當其把「個人」等同於「私利」而加以排斥，從而走入極端之時，就可能出現歷史悲劇。

對溝口雄三的中國歷史觀的評論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們只是從他的問題意識裏生發出自己的問題：中國「現代」（即溝口所言的「近代」）歷程的曲折，真的如許多評論認為的那樣，僅僅是政治精英乃至領袖選擇了錯誤的道路？還是他們本身內在於、也受制於中國獨特的歷史結構？在制約中國「現代」道路的這種歷史結構中，民眾究竟佔有怎樣的地位，並發揮着怎樣的作用？在經過以西方自由民主理念長期、持續地批判現實和歷史之後，筆者也不免狐疑起來——倒不是疑心自己所信奉的理念，而是懷疑自己基於理念所建立起的批判對象，只是一個自己拿尺子度量出的主觀對象，歷史並沒有被客觀化，現實也沒有呈現出它應有的質感，自己的批判僅僅是一種外部的批判。正是在這一懷疑和自覺之中，筆者發現政治精英乃至領袖並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樣，可以完全地、隨心所欲地主導歷史，他只能在歷史結構的矛盾、悖論之處把握契機，使之不至於走向其固有的「扭曲」。當一個領袖看起來真的猶如變魔法般可隨心所欲地主導歷史時，那正是歷史結構敞開其「扭曲」的大門之際，包括民眾也從中獲得了極大的安慰。文革中「大公無私」、「鬥私批修」，以及「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般無情」能夠蔚然成風，不獨是領袖的號召使然，也正是這種歷史結構的極端表現。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中國民粹主義」這個命題，就會發現中國「前現代」（即溝口所言的「前近代」）的大同思想，本身就帶有「民粹化」特徵。它直接制約、規定了中國的共和道路，並塑造了國體和政體的性格。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正是安撫、馴化、滿足、改造這種「民粹化」的過程。1949年前國共兩黨的「國是之爭」的最終結局，便預示於這個過程之中。此後，中國大陸的大起大落和台灣的穩步發展，也隱含在這一歷史邏輯中。而從1990年代確立了市場經濟之後，並未繼承1980年代尋找歷史契機時的全面考量和小翼翼，而是帶着一種權力的傲慢，直奔權貴資本主義，從一種病態的「大公」快速走向一種病態的「大私」，讓伴隨這一過程的經濟高速發展也相形失色。它帶來的直觀後果，便是文革意識形態的重新復活和高聲吶喊；其非直觀的後果，則是人們在破碎的心靈和無奈的現實之中模糊地渴望着一個強人的出現——只要能掃清眼下的障礙，哪怕是一點點，都會獻上自己的愛戴。

薄熙來及其「重慶道路」真正需要的正是這一種群眾——他們未被「權利意識」侵染，內心的底色仍然是變相的「大同」，現實的渴求僅僅是「有衣有食有屋」。他們是權貴資本大行其道的間接受害者，心靈破碎，面孔模糊，並未形成清晰的意識形態，因而也不會提出任何冒險的政治主張，像毛左派所做的那樣。但他們也同時是歷史的英雄，是上述中國現代歷史結構的能動的因子。在中國式市場經濟強力推行的過程中，其他的政治精英對群眾基礎與歷史結構的關係並非一無所知，只是官僚機構的惰性和權力的傲慢，使他們大多無視這一

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正是安撫、馴化、滿足、改造「民粹化」的過程。1949年前國共兩黨的「國是之爭」的最終結局便預示於這個過程之中。此後，中國大陸的大起大落和台灣的穩步發展，也隱含在這一歷史邏輯中。

點；反而出於信條般的「發展主義」邏輯和所屬利益集團的私利，其中的不少人由間接受害者轉化為直接受害者，適得其反地逼迫其走向「權利意識」的覺醒。但薄熙來卻洞悉這一切，明白在自己問鼎權力——我們至今不知道他僅僅是出於臨時的權力角逐，還是另有「創造歷史」的勃勃野心——的過程中，上述群眾會是他精彩演出的忠實觀眾。

而對於與「重慶道路」格格不入的自由派而言，如果不能了解薄熙來的「群眾基礎」與歷史結構的內在關係，而僅僅以外部批判的慣常方式和高高在上的啟蒙姿態對待之，恐怕也將失去真切體認現實的機會，失去更有力的介入歷史的契機。

對於與「重慶道路」格格不入的自由派而言，如果不能了解薄熙來的「群眾基礎」與歷史結構的內在關係，而僅僅以外部批判的慣常方式和高高在上的啟蒙姿態對待之，恐怕也將失去真切體認現實的機會，失去更有力的介入歷史的契機。

註釋

- ① 褚朝新：〈重慶公安局高層談王立軍時期：誰敢說治安不好就可能被收拾〉，《南方周末》，2012年12月20日。
- ② 劉潔、倪志剛：〈「打黑基地」鐵山坪裏的回憶〉，《瀟湘晨報》，2012年12月10日。
- ③ 〈重慶不育夫婦唱紅歌喜得貴子〉，《晶報》，2011年6月28日；〈重慶三峽中心醫院用紅色革命文化和健康教育為精神病患者治病〉，據稱為新華社發，目前仍散見於內地網絡；〈重慶癌症患者稱靠唱紅歌挺過化療：一聽就忘了痛〉，《重慶日報》，2011年6月22日。
- ④ 躬雲山：〈我的「老左」朋友〉，《白紙黑字》（蘭州），2010年總第1期，頁36-44。
- ⑤ 〈李乾有話說〉（2012年3月22日），凱迪社區，<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205513&boardid=1>。
- ⑥ 〈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義）關於10.15重慶反革命事件的聲明〉，<http://hi.baidu.com/nhk007/item/6071c213fb8cad9999ce33b6>；滅燈：〈再憶兩年前的今日，兼議「救黨保國」〉（2011年10月15日），原刊於解放區的天網站。
- ⑦ 參見〈重慶「造反派」向薄熙來喊冤 民眾嘲笑〉（2011年8月31日），大紀元，www.epochtimes.com/b5/11/8/31/n3359788.htm。
- ⑧ 位卑未敢忘憂國：〈我們該怎樣對待薄？〉，修改版參見紅石頭論壇，www.hst1949.net/showtopic-12104.aspx。
- ⑨ 袁庚華：〈對重慶事變的解讀〉（2012年3月19日），天涯論壇，<http://bbs.tianya.cn/post-no01-452266-1.shtml>。
- ⑩ 〈烏有之鄉關於薄熙來事件的聲明〉（2012年5月21日），原始森林，www.jys.ykedu.net/supesite/html/5/5-5997.html。
- ⑪ 〈2011年7月21日，王立軍會見司馬南等人〉（2012年12月15日），中華論壇，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52/31/34/1_1.html。
- ⑫⑬ 《重慶·2012》，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chungking/>。
- ⑭ 〈重慶政界人士：民粹主義是中國未來最大的威脅〉（2012年12月25日），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chungking/content-2/detail_2012_12/24/20481807_0.shtml；《重慶·2012》。
- ⑮⑯⑰ 溝口雄三著，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12-15；15-16；19。